

“马背院士”吴天一：把根扎在青藏高原

“七一勋章”获得者

新华社西宁7月13日电(记者央秀达珍、卢东方)世界屋脊上,一位80多岁高龄的老人带领医学团队,常年跋涉在离蓝天、白云最近的天路。50多年来,他推动我国高原医学从无到有、由弱变强,在漫长艰辛的奋斗历程,践行着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他的名字,深深烙在青藏高原各族群众心中。

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高原医学事业的开拓者、低氧生理学与高原医学专家。今年6月29日,他站上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领奖台,戴上了代表党内最高荣誉的“七一勋章”。

高原的守望者

【一个愿望】

20世纪30年代,吴天一出生在新疆伊犁一个塔吉克族知识分子家庭。他9岁随父母去南京读书。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正式打响。在南京,吴天一顺利通过征兵体检,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别看我个子小,但体质好。我当时只有一个愿望,参军报国。”吴天一说。由于文化功底良好,一入伍他便被分配至中国医科大学培养。6年的理论培训结束后,抗美援朝已经签订停战协议。“但当时部队还没撤回,我就强烈要求去前线。”

1957年,吴天一与夫人一起,换上志愿军的服装,来到位于平壤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12医院。在那里,因为防治疫情得力,他获得第一个三等功。

1958年随部队回撤到青海后,为响应当时“大练兵”号召,吴天一被分配至某骑兵连。“我要当一名普通兵。”吴天一说,在骑兵连他获得了“五好战士”荣誉,为他之后常年在高原“骑马问诊”打下了基础。

【一个决定】

20世纪50年代末,大批青年怀着梦想,来到青海建设高原。意想不到的,许多初到青海的内陆建设者很快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心慌、胸闷、头痛欲裂……由于缺乏高原病基本知识,很多高原病被当作普通肺炎、肺充血症治疗,许多建设者相继病倒甚至献出了生命。

吴天一说,当时高原病在我国医学研究领域尚属空白,国内对它认识不清,国际高原医学领域只有外国人说话。“我要攻克高原病”,这一决定让他接下来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高原医学研究。

“青藏高原缺氧、低压的恶劣环境,阻碍了人们开发高原的步伐,也威胁着这里居民和官兵的健康和安全,必须找出高原病的致病原因并不断研究下去。”吴天一开始用所学的医学知识保障高原人民的生命和健康。

“马背上的好曼巴”

【一个标准】

1978年,吴天一与同事共同创建了全



左图:“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天一(6月29日摄)。
右图:6月17日,吴天一(前)在青海西宁的实验室内和学生讨论。

国第一家高原医学研究所。为尽快全面掌握各种急慢性高原病,1979年至1992年,吴天一主持了历时10余年、覆盖10万人的高原病大调查。“每到一地方,我都问哪里海拔最高?”吴天一说,高原医学研究必须要去高、偏、远的地方,不落下一户一人,才能准确掌握疾病分布和患病因素。

“到牧区下乡,帐房一支,仪器一架,发动机一响,牧民们以为是电影放映队来了。”吴天一克服头痛、胸闷、失眠、腹泻和呕吐等高原反应,骑着马,赶着驮满仪器的牦牛,深入牧区的帐篷做高原病普查。饿了吃点牧民的青稞糌粑或自带的干粮,晚上同牧民一起睡在零下三十多摄氏度的帐篷里,深夜点着酥油灯整理数据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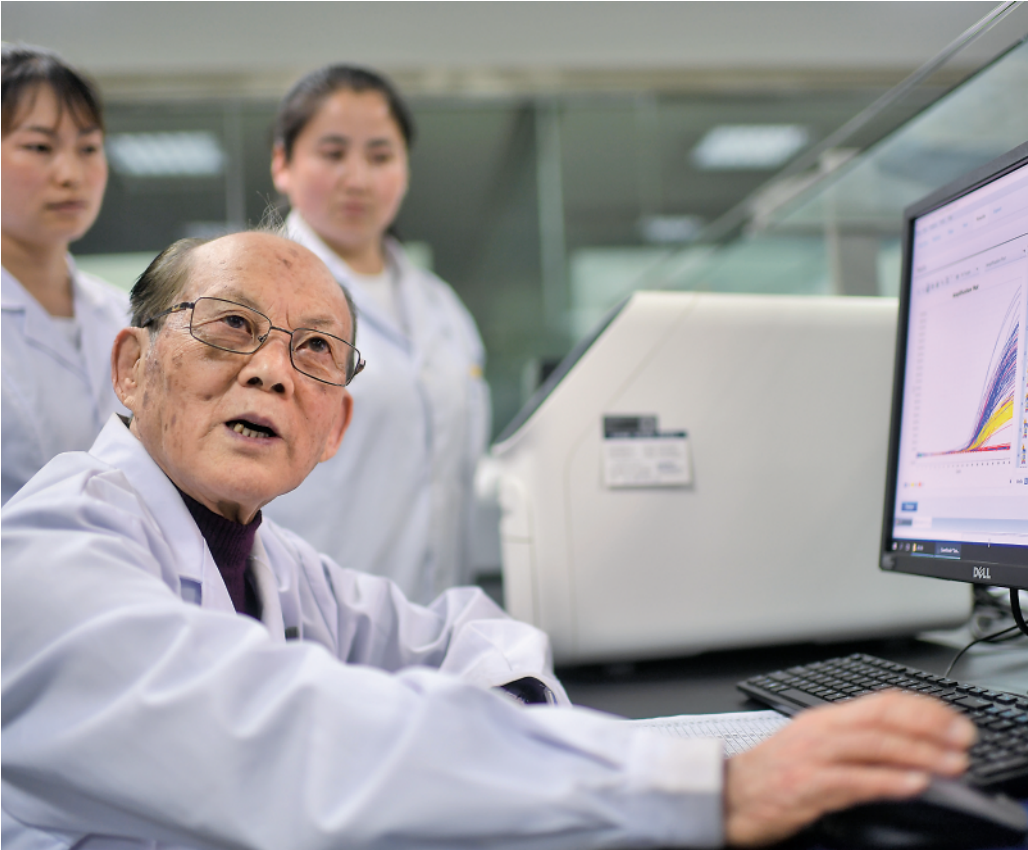
为研究青藏高原藏族人群“高原低氧适应生理特征”这一主攻课题,精通汉语、塔吉克语、英语、俄语的吴天一,又学会了藏语。几十年的科研工作,他走遍了青藏高原大部分高海拔地区,诊治过数万名牧民群众,整理了大量的临床资料,藏族牧民亲切地称他为“马背上的好曼巴(医生)”。

【一条铁路】

吴天一一对发生在青藏高原的各型急、慢性高原病,从流行病学、病理生理学和临床医学方面做了系统研究。他提出慢性高山病量化诊断标准,被国际高山医学协会作为国际标准并命名为“青海标准”,于2005年在国际上统一应用,为高原病的防治作出了突出贡献。

【一条铁路】

高寒缺氧对铁路建设者的身体健康是一个严峻考验,这是建设高原铁路的一大世界性难题,也对高原医学提出了新挑战。



新华社记者谢环驰摄
新华社记者张宏祥摄

青藏铁路建设5年中,作为原铁道部高原医学专家组组长,吴天一带头制定出一系列劳动保护和高原病防治措施,建立了全面科学的卫生保障措施和急救方案,将高原病的自我判断方法写入科普手册,送到每个筑路工人手中。

“青藏铁路沿线80%的地方海拔都在4500米以上。在这里吸进来的氧气只有海平面地区吸氧量的一半。”吴天一说。

他亲自带领科研医疗队上山指导工作,研究开发以藏药为主的红景天等致适应剂,提出“三高三低”急救措施,使急性高原病发病率由青藏公路建设初期的9.8%降至1%以下。

吴天一的研究不但保障了青藏铁路的顺利建设,而且创造了14万劳动大军在海拔4000米以上地区工作4年、无一例因急性高原病死亡的世界医学奇迹。

生命的保护神

【一场地震】

“我既是医生又是党员,还是最懂高原病的人,我必须去!”2010年4月14日,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发生7.1级地震,年逾古稀的吴天一彻夜未眠,主动请缨,不顾同事和家人的劝阻连夜带领医疗队奔赴灾区。

到达灾区后,他日夜奋战在救灾一线。白天,往返奔波于各大救援点,指导并参与高原肺水肿病人的抢救;夜间,辗转各医疗队讲解高原病防治救援知识,尽全力拯救群众生命、保障人民健康。他还发挥懂藏语的

优势,为受灾群众讲解知识、疏导心理。

“这是世界最高海拔地区的地震,我们要以共产党人的精神战胜高原地震灾害。”吴天一。震后,他主持召开了多个会议,进一步总结玉树地震救援经验,并面向国际社会介绍了中国抢救急性高原病的成功经验。

【一生追求】

全身14处骨折,双眼白内障,耳朵鼓膜被击穿……吴天一身体饱受病痛折磨,但他仍深深迷恋着这片土地,扎根高原从医50多年,默默守护着青藏高原的万千生命。

吴天一在下乡途中曾经历过多次车祸。最严重的一次他多处肋骨骨折、髌骨粉碎性骨折、胫腓骨骨折。至今,他腿部还有一块十几厘米长的钢板。

高原长期的紫外线辐射让吴天一的双眼患上严重的白内障。术后,他没有休息片刻,立即投入到实验中。左眼工作,右眼就戴着眼罩休息;累了,再把眼罩换到左眼上……

在进行高低压实验氧舱模拟实验中,吴天一主动承担第一次实验的风险,毫不犹豫地进入了舱体。由于缺乏经验,舱内气压迅速下降,他的鼓膜被击穿,听力严重受损,但他摸清了舱体运转的安全系数。

吴天一在卫生健康领域奋战一辈子,获得无数荣誉。“青藏高原是我科学研究的根,是我生命的根,高原医学研究是我一生的追求。”“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是荣誉也是考验。未来我要带好团队培养好接班人,为保障高原人民和官兵的健康作出更大贡献。”他说。

党的领导是实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政治保证

专家解读全过程人民民主

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记者史竞男、陈菲)“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出明确要求。

专家表示,“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重要论断,精辟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显著优势和特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的旗帜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祝灵君表示,所谓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指在我国,人民依法享有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始终贯穿国家政治

生活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祝灵君认为,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以实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在汲取前人失败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成功找到了一条民主新路——人民民主。

祝灵君指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把人民平等参与和平等发展的权利结合起来,把民生建设和民主建设结合起来,把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结合起来,推动人民民主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要坚持以党的领导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祝灵君说。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实践

证明,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辛向阳说。

“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他表示,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搞民主形式主义,不搞“民主秀”,不搞政治戏剧,不追求表面的华丽和做作,而是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彼此贯通起来,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

全过程人民民主也是不断发展完善的民主。辛向阳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为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利不懈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充分展现出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产生、发展和不断完善,保障了中国道路的成功,有利于广泛凝聚社会共识,为国家发展汇聚磅礴力量。

实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离不开党的领导

“全过程人民民主最为关键的,是这种民主始终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根本政治保证。”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刘世军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他表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至上,党制定一切路线方针政策都坚持充分发扬民主,注重调查研究,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贯彻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内政外交国防军队和社会生活全过程各领域,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发展,成功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人民愿望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之路,我们相信这条道路必定会越走越宽广。”刘世军说。

家史与党史

1963年6月份,高考前体检,结果说我患血吸虫病不能参加考试。这对我而言无疑是晴天霹雳,一天没吃没喝,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对于命运的安排尽管无奈,最终还是要接受。“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毛主席这句话鼓舞着一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成了其中一个。

回到老家的当天下午,我背上一把挖锄,跟随生产队社员一起去挖抗旱渠。同龄人见到我,七嘴八舌地嘲笑不停。

“你上午回来的吧,毕业了没?”“你不外出工作,回来修地球?”

我偶尔回答一两句,手里举起挖锄拼命地挖,不一会,满手的血泡染红了锄柄。叔伯们围过来劝我歇着,可我强忍着,坚持到天黑。

对于我来说,想当一个农民也没那么容易,其实还要过“三关”。

第一关是家庭关。“我吃了这多苦,就为你回来摸牛屁股?”父亲经常骂我没出息。有一次,他甚至生气地对母亲说:“他不出去工作,那我们出去讨饭。”

第二天,父亲真的去街上帮供销社磨豆腐,母亲也去了姨妈家。我收工回家,灶是冷的,米缸是空的。我跑到自留地扯回两棵白菜,没有油,加点盐,炒熟吃完下地干活。春节过后,父母见我铁了心,也只只得随我。

第二关是社会关。从学校重新回到生产队生产,村子里没有一个人不说:“俺冯家塆地势高,没有风水,出不了人才,读一百年书还是要挨犁尾巴。”队里的人都不喊我名字,见到就叫我“书呆子”。

对这一切,我听在耳里,但不放在心上,因为我有一个信念:一定要做出成绩让他们看。

我抽空打扫出一间空房,借了桌凳,又将自己所有的书搬出来,在家里办了个夜校:读书、学唱歌、拉胡琴、排练文艺节目……备课、刻蜡板、印小报,我经常忙到深夜。

我创办的《坡上新风》小刊,对队里的好人好事进行评论。开始只有我一个人写,后来年轻人都拿起了笔。

春节,队里放假,我带领几十个年轻人,把村前村后的垃圾以及堆在堂屋多年的陈土挑到地里,挂上“试验地”的牌子。开春,又带头除草皮挑沙土,40亩烂泥田被改造成了丰产田,当年每亩增产一百多斤。

我还组织了青年突击队,队里有难活重活,几十人一起上,无论什么活都很快拿下来。

队长刘高兴见我把年轻人的积极性调动了起来,生产进度加快了,高兴得合不上嘴。

1964年8月,我提议在队里办半耕半读小学班。刘高兴同意了,答应承担一个民办老师的工分。第二天,我们几个青年骨干到各家去动员,全队二十多名学龄儿童全报了名。

经验很快传到区里,他们来总结经验。这时我已经是大队团支部书记,又把经验传到各个生产队。在大队,以初中毕业生为对象,办起了业余耕读高中班。

第三关是劳动关。开春学犁田,我总掌握不了技巧,半亩田犁了大半天;打石灰又苦又累,一筐石灰三十多斤,我左手提着右手撒,风一吹,从头到脚都是灰;秋收割稻子,中午十二点,烈日当头晒,我热得差点哭出声;冬天修水利工程,我总是穿双草鞋,泥里来水里去,有时还要破冰下水……经过几年的磨炼,一切农活都难不住我。

命运似乎跟我开了一个玩笑。因为患血吸虫病而放弃高考、回乡务农的我,后来成长为卫生战线的一名公务员。

我先后当过镇卫生所所长、镇血防组长、镇卫生院书记、县医院副院长、县卫校书记、县卫生局纪委书记,长期奋斗在卫生系统第一线。

上世纪70年代,我带领专业灭螺队,长期住在湖区灭螺。通过摸索,我们发现湖区灭螺有效办法是水浸10个月以上。于是我带着灭螺队员,将湖沿岸的茅草砍倒,晒干后放火烧钉螺。之后铲草皮,洒药浸杀,将钉螺一网打尽。

如今我已年过八旬,让我颇感欣慰的是,早在10多年前,阳新县就实现了对血吸虫病的传播阻断。全县人群感染率、钉螺感染率已连续数年保持为零。

我的子女们都健康成长,不再因为疾病而重复我的苦涩人生。有2人取得博士后学位,2人取得博士学位,1人取得硕士学位,3人取得本科学历。2015年,我们家还荣获首届“全国最美家庭”和“全国教子有方‘最美家庭’”荣誉称号。

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始终坚信通过奋斗可以改变人生。

刘时粘(作者系湖北省阳新县退休干部)

闯过三关当农民